

红四方面军 入川记 ④

潢川，地处河南省东南部，南枕大别山，北濯淮河水，这片土地，既是战国时期春申君黄歇的故里，也是中华黄姓的重要发源地，素有“河洛重镇、吴楚上游”之誉。1913年，因淮河支流潢河穿境而过，此地正式得名潢川。1931年11月至1932年6月，红四方面军连续发起黄安、商(城)潢(川)、苏家埠和潢(川)光(山)四大战役，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三次“围剿”。

1932年初，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后，正准备进犯上海，然而国民党当局不仅压制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更持续加紧对革命根据地地的“围剿”。随着重兵向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集结，意味着早在1931年9月至11月部署、却迟迟未全面展开的第三次“围剿”即将拉开帷幕。面对强敌压境，红四方面军冷静分析局势，敌人虽人数众多、装备精良、补给充足，但因内部派系纷争、战术机械僵化、上层官僚腐败、下层士气低落，已埋下失败的伏笔。

□文/图 冉奎



苏家埠战役陈列馆(安徽省裕安区苏埠镇横排头景区)。

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

■商潢战役

潢川县烈士陵园暨商潢战役历史文化园，位于河南省潢川县江家集镇，是一座依托商潢战役旧址修建的红色纪念园区。战役期间，红四方面军12师34团、36团在此阻击敌军。

1932年1月13日，红四方面军为打击活动于鄂豫皖苏区北部的国民党军队，以夺取商城，并打通鄂豫边与皖西两块苏区的联系，决定在商城、潢川地区发起攻势。鉴于商城守军防御工事坚固，短期难以攻克，且敌第二师驻扎于商城与潢川之间，直接威胁红军对商城的进攻。红四方面军决定集中4个师，首先歼灭敌第二师，切断商、潢两地守军的联系，然后夺取商城。

当时，国民党在商城、潢川地区集结重兵。敌五十八师主力驻守商城，一部位于商城北商潢公路河凤桥；敌十二师主力驻潢川城区，一个团配置于潢川东南商潢公路北亚港；敌第二师及一个独立旅布防于北亚港东南商潢公路流店(今河南省潢川县流店乡)、杜甫店(今潢川县江家集镇杜甫店村)和江家集(今潢川县江家集镇)一线；敌四十五师位于固始地区，与商、潢之敌形成犄角之势。敌军企图以商潢公路为轴线，南经商城、麻城东北区延伸至麻城，构筑一条隔离地带，从而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分割为东部的皖西和西部的鄂豫边两部分，以便展开大规模“进剿”。

1月19日，北风凛冽中，红4军10师、11师、12师相继由黄安挥师北上，位于皖西的红25军73师西进参战，商潢战役打响。26日，红73师在红12师的配合下，从西南和东北两面夹击河凤桥、龙头桥，迫使守军退回商城。我军控制了商城与潢川间的全部公路，切断了商城与固始间的联系，使敌五十八师在商城陷于孤立，实现了战役计划的第一步。

红四方面军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攻打商城，以红73师及红10师一部包围商城，大造攻城声势，吸引潢川敌军增援，而将主力隐蔽集结于商潢公路两侧。以红10师的一个团抵近潢川，诱其出援，主力隐蔽集结于杜甫店待机。

2月7日，农历正月初二，大雪纷飞中，聚集于潢川的国民党军3个师另一个旅共19个团，分左右两路大举增援商城。红12师在杜甫店高地抢构阵地，担任正面阻击，红10师、11师和73师分置于12师的两侧，从两翼对敌实施迂回包抄。8日，我军按预定部署向敌人展开攻击，歼敌一个团，包围其指挥部，抢占了流店渡口。右路国民党军见后路被切断，顿时混乱，纷纷后退。左路敌军随之动摇。我军乘胜全线展开猛烈反击，数万国民党军争先向北溃逃。9日，我军乘胜追击，直逼潢川近郊。敌第二师遭受歼灭性打击，商城国民党守军见援兵受挫，弃城南逃麻城。围城围得紧，打援打得狠，我军不战而克商城。

陈赓在1932年3月18日的日记中写道：“在我担任红12师师长时，率部转战商、光、潢、固……在潢郊之(北)亚港、双柳林、仁和集、杜甫店等地屡歼国民党军队。尤以杜甫店一役，歼国民党第二师，仅红12师即俘敌数千。”

至2月10日，历时23天，红四方面军歼敌5000余人，缴枪2000余支、野炮2门。尤其是杜甫店一战，我军以10个团击溃敌19个团，敌第二师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刚刚投入鄂豫皖战场，一出马就大败而逃。商潢战役取得胜利，打破了敌人苦心建立的隔离地带，收复了商潢公路沿线的广大地区，根据地获得进一步

巩固和发展。

■苏家埠战役

苏家埠战役纪念馆位于安徽省六安市裕安区苏埠镇横排头景区，是为纪念1932年苏家埠战役而建立的纪念设施。

为了扩大战果，红四方面军总部令红73师返回皖西，准备向淠河以东发展，总部率红10师、11师、12师向北行动，打击固始敌四十五师。在此期间，国民党不断调兵遣将，向皖西根据地进逼。敌四十六师(辖一三六、一三七、一三八旅)全部、五十五师一六三旅和警备一、二旅共12个团，从六安城至霍山城沿淠河东岸以苏家埠为枢纽，构成一线防御。另两个师又两个旅分布于合肥、潜山、蚌埠予以策应，企图阻止红军向东发展。

3月18日，红四方面军主力经长途奔袭，到达皖西。20日，在独山与先期返回皖西的红73师会合。红军在戴家茶行召开部队团以上和地方干部会议，鉴于敌人一线和二线兵力之间空隙很大，决定集中力量，首先歼灭苏家埠之敌，以求在运动战中粉碎敌人的“围剿”。

3月21日晚，红四方面军总部率红10师、11师、73师秘密东渡淠河。22日拂晓，打响苏家埠战役。我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侧后方迅速将苏家埠、青山店、韩摆渡之敌分割包围。红73师一部和霍山独立团则负责阻敌增援。敌人措手不及，外围据点被迅速扫清，龟缩于几个主要据点内，企图固守待援。

我军对被围之敌并未采取简单的强攻，而是采取“围点打援”的策略。各围点部队在当地群众的支援下，昼夜不停地构筑工事。时仅一周，环绕敌据点的交通壕、盖沟、掩体密如蛛网，形成多层包围圈，实行长期围困。在坚固工事和严密火力封锁下，困守之敌犹如瓮中之鳖，而红军战士在工事内练兵上课，歌声不绝。同时，将主力部队隐蔽集结于机动位置，将战场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迫使敌人按照红军的节奏行动。

4月中旬，苏家埠和韩摆渡守敌被围月余，弹尽粮绝，敌飞机空投粮食，但多数落在红军阵地。我军在阵地上支起大锅，炖肉熬粥，趁机开展政治攻势，欢迎敌军士兵前来讨取食物。被困敌军在浓郁的肉香和“老乡老乡，快快缴枪……长官洋面，鱼肉鸡汤。你们吃糠，树皮啃光；更有兄弟，饿死床上。飞机运粮，有啥指望”的歌声里，无心战斗，“携枪投诚者”指。

4月下旬，面对残局，蒋介石任命嫡系第七师代师长厉式鼎为皖西“剿共”总指挥，指挥15个团约两万兵力，由合肥出发，增援苏家埠。敌人兵力雄厚，来势汹汹。红四方面军认为敌人劳师远征，建制复杂，指挥不统一，且必经陡拔河这一险地，可以布设一个巨大的伏击圈将其歼灭。于是，我军决定以小部兵力继续围困苏家埠、韩摆渡，以红73师在樊通桥地区构筑阵地正面阻击，以红10师、11师主力在红73师阵地两翼伺机迂回包抄，以红73师一个营和六安独立团进至陡拔河佯作抵抗诱敌入圈。5月1日晚，担任主攻的部队与敌接触后，边打边撤。2日，敌我双方在陡拔河交战，将敌人包抄分割。红军一部摧毁了设在小华山的敌军指挥部，活捉了化装逃跑的厉式鼎。两万援兵除少数漏网外，均被歼灭。

苏家埠、韩摆渡守敌曾几次冒死突围，得知援军被歼，彻底绝望，很快土崩瓦解。5月8日全部缴械投降。红军兵不血刃，收复最后两个据点。至此，苏家埠战役胜利结束。

苏家埠战役历时48天，共歼敌19个团、两个警备旅3万余人，缴获枪支1.6万余支、机枪250挺、各种炮44门、电台5部，击落敌飞机一架。这是鄂豫皖苏区史无前例的大胜仗，是红四方面军围点打援、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是中国工农红军建军以来规模最大、缴获最多、代价最小、战果最好的一次空前大捷。

■潢光战役

1932年3月至5月，红四方面军主力在皖西地区打响苏家埠战役期间，国民党调大军继续向鄂豫皖苏区进犯。敌二十路军有七十五、七十六两个师共6个旅，两个旅担任潢川县城及近郊的守备，一个旅驻潢川以南的仁和集、一个旅驻东南的双柳树(今河南省潢川县双柳树镇)、一个旅驻江家集、一个旅部署在桃林铺。敌新编二十师守备光山县城及其以南椿树店、槐树店等地。

6月初，红四方面军总部率红10师、11师、73师和少共国际团，由苏家埠回师豫东南商城地与红12师会合。12日，针对敌人“巩固潢川、四处分兵、广占地盘”的态势，为收复被国民党军占领的潢川、光山南部地区，打破敌人的封锁与进犯企图，我军采取“分割包围、各个击破”的作战方案，打响潢光战役。

红10师由商城直出光山以南的椿树店、槐树店，钳制光山之敌；红12师进攻双柳树；红73师和少共国际团包围仁和集，并吸引潢川之敌南援；红11师秘密进至潢川以南的卜塔集、彭店地区，负责阻击可能由潢川南援的敌人。

6月13日，红12师以“三面围攻、网开一面”的战法，诱敌于突围中歼敌两个营，成功攻占双柳树，将北逃的余部歼灭于薛店地区。同日，红11师抓住敌人守备的薄弱环节实施突然攻击，经过整日激战，成功攻占卜塔集，歼灭由潢川南援的敌五十六师、五十七师各一个团，活捉敌七十六师参谋长李亚光。

双柳树、卜塔集之敌被歼灭后，被困困于仁和集之敌陷于孤立，极度恐慌，斗志全无。6月14日至15日，仁和集的敌军多次尝试突围，均未得逞。红73师采取“围而不攻、日夜袭扰”的战法，先囤困袭扰，待敌势孤援绝、恐慌逃跑脱离阵地时予以包围歼灭。16日拂晓，红10师和少共国际团两个团在红军阵地拼命突破一个缺口，向西逃窜，被红73师主力追歼，敌旅长李万林被活捉。与此同时，红73师一部和少共国际团将未及逃窜的守军约一个团就地歼灭。

至此，潢光战役发起的日子是6月12日，农历四月廿八。战役胜利后，歌谣《红军英雄汉》在潢川城乡唱响：“四月二十八，红军真可夸；鸡叫头一遍，队伍就出发。开到卜塔集，四面把营扎。冲锋号一响，人人上战场。看那白匪军，个个都害怕。红军英雄汉，机智又勇敢。头顶湿被套，冲锋打前哨。战到五月一，敌人都完蛋。活捉参谋长，团长见阎王；剩下敌残部，缴枪投了降。”

红四方面军连续取得黄安、商潢、苏家埠、潢光四大战役的胜利，向东威胁南京，向南直逼武汉，歼敌6万余人，其中歼灭成建制的敌正规军近40个团，使第三次“围剿”尚未开始就遭破产。国民党反动派极为恐慌，蒋介石不得不暂缓对中央苏区的“围剿”，集结重兵对鄂豫皖苏区开展第四次疯狂的“围剿”。

何以“宕渠” ——解锁渠江流域古文明密码

□刘渠

“宕渠”这个词条专用于先秦时的一个县名，即巴郡六县之一。然而，解析这个古县名，却非三言两语可以说得明白。日前，有文化学者扒梳古籍，说道其来历及相关历史故事，广征博采，把一个“冷知识”讲成了文史“热词”，刷亮了朋友圈。笔者读后觉得意犹未尽，想从“行政建置”“县名涵义”“文化记忆”三个维度做一点发挥，让读者进一步了解何以“宕渠”，有什么样的文明密码。

行政建置之宕渠

考古资料显示，一万年前，先民们已在大巴山和渠江流域活动。在新石器时代早中期，先民已经大量使用磨制石器、陶器及动物骨头制作的用具，在沿袭狩猎和捕捞生产的同时，开启了原始农业生产。考古专家据以判断：渠江流域具有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年的文明史。

这为我们比较合理、准确地识读达州乃至整个渠江流域第一个政区建置何以“宕渠”，提供了科学的历史叙事背景。

首先，“宕渠”出现在文献里是一个县级行政建置单位。始见于《汉书·地理志》：巴郡，秦置。(下列)江州、阆中、宕渠等11个县名。

其次，“宕渠县”究竟何时建置？这个问题事关重大。

20世纪80年代，我们编修《渠县志》沿革卷时，已知宕渠为秦置而非汉初建置，经过考察论证，确定为公元前314年与巴郡同时建立。依据是什么呢？

《史记》八书不讲地理，秦代有多少个郡至今还没有确数，更不说多少个县。故有钱穆读史而作《史记地名考》。虽然历代地理总志以及清代《四川通志》皆依据《汉书·地理志》称宕渠为“汉县”或“本汉旧县”，但在逻辑上不通讲。既然巴郡为秦置，有郡而无县何以立之？宕渠县基本覆盖整个渠江流域，有4万平方公里之广，偌大一个地方并没有直隶于郡的说法，又有一个强大的板楯蛮族群世代所居，秦并巴蜀而置郡县，不仅象征王权之所及，建县的条件也完全具备，为地方治理所必需。

东晋《华阳国志·巴志》载，秦惠王更元九年(公元前316年)蜀王伐苴侯及巴国，巴王求救于秦。秦国借机发兵灭蜀，葭萌关一役斩杀蜀王，张仪“贪巴苴之富，遂灭巴，执巴子以归。”又说“仪城江州”，为设置巴郡修筑了城垣。

《巴志》宕渠郡：“长老言，宕渠盖为故賈国。今有賈城、卢城……始皇时，有长人长五丈见宕渠。”在秦并巴蜀这个时间节点上，宕渠与过去的“賈国”一脉相承；而秦始皇时已有“宕渠”之名。

上述记载表明了一个史实：宕渠县为战国中晚期，秦国惠文王时与巴郡同时建置，距今已2340年。

其三，考古材料提供了宕渠为秦置的直接证据。2002年，湘西里耶古城3.6万枚秦简横空出世，是一项重大考古发现。从秦王政二十五年至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22年—公元前209年)连续记载了洞庭郡迁陵县各方面政务及民事活动，其8-657号简文：“【庚】午水下五刻，土五宕渠道平邑疵以来”。意即某件文书是由宕渠道平邑里一个叫“疵”的士兵带来的。

当时的记录是可靠的文字依据。商鞅变法，全面推行郡县制。秦统六国后实行文书同轨的制度变革，地方上，“县有蛮夷曰道”，宕渠是板楯蛮聚居之地，称“宕渠道”亦在此时。刘邦为汉王时又复称为县。

明晰宕渠县始置时间的意义在于，突破了古代和近代人们的历史认知，纠正了传统的汉县说法，“宕渠”是一个战国古县，建县史提早了112年。

宕渠县名之涵义

“宕渠”是一个新词汇，战国中期以前的文献不见记录。循名责实考镜源流，是文史工作的题中之义。

最早对“宕渠”注释的是唐代李贤等注《后汉书·吴汉传》。后来给予宕渠注释的包括当代学者的说法虽多，不乏引经据典或者极尽巧思，但是没有从字源意义上深入考察，更没有联系数千年来开拓耕耘在这片贫瘠土地上的先民们的原始生活状态，领悟“宕渠”二字的初始意义和深刻含义。因此，我以为均未讲到点上。

曾经注释“宕渠”的说法大致有以山水命名说、字面直译(如“石过水为

宕，水所蓄为渠”)、古文注疏(“文犀之渠，谓楯”)等，还有以字义+推论想象的，据称：宕渠，就是住在高大房子里的板楯蛮。有点颠覆古汉语构词义理及表达习惯，相当“饶舌”。何况上古蛮夷之邦哪来高大的房屋？意思互不搭界。这些似乎都不大靠谱。

我们还得从字源意义上考察。查《说文解字》：“宕，过也。一曰洞屋。从宀。”(取义不从石)

“渠，水所居。”(应劭《风俗通》也是这么讲的)

两个字均有居处的含义。而“宕渠”二字连用，应当按居处的思路去理解，就如传说中的“有巢氏”。人类步入文明社会之前，穴居洞屋、树上巢居、傍水搭棚的记忆是深刻的。古往今来，不同的民族几乎均有其特定的居住形式，或形成了各自建筑艺术的民族风格，例如传承至今的苗寨、土家吊脚楼等。电视片“河姆渡文化”情景模拟中，其人在湖边结茅棚，临水搭建一块扎木平台作为进出、解解船筏及活动地儿之用，正是“水所居”的一种样式。

当作政区命名的宕渠，一定有其寓意、有所指代。虽然它是汉语言文字的意思表达，但在很大程度上须与土著居民中“文化人”的描述直接相关，从而被官方记录在案。“宕渠”应是先民最早的居住形式，即以天然洞穴及河畔结庐而居的“宕渠居式”。大巴山脉、华蓥山平行岭谷溶岩洞穴分布广泛，加之水系发达，先民最便捷的可能是就地取材、因地制宜。那么采集渔猎生活与“宕渠居式”就有着实际的能够允许的客观物质条件。这与先民采集、渔猎生产生活形式相适应，这种居式在农耕村落形成之前，与先民的文明进步相伴，族人人口相传、代代复述而深入人脑，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就是说，“宕渠”是一种居式，是渠江流域先民穴居洞屋、傍水结庐而居的居处样式。首次用于政区建置命名，乃当时人们对于先民时代的怀念和追思，寓意深刻。

历史文化之宕渠

“宕渠”县名之涵义，揭示这是一个文化范畴。宕渠文化是对渠江流域历史文化的概括，是巴文化的宕渠模式。

渠江流域温暖湿润，植被茂盛，动物孳繁。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先民们不断展开大巴山及渠江流域的地理“大发现”。《山海经·中山经》第九列之“蛇山”即是大巴山之前称，盖因多蛇之故，常有大蛇出没。先民们在生存境遇的认知过程中，因为惧怕、惊奇而产生敬畏崇蛇心理，遂以夸张的巨蛇形象作为氏族图腾徽记。

“巴”应是他们对其图腾的称谓，也是自称的语音。在这片广袤土地上，以“巴”具名的山山水水、动植物不胜枚举，盖因巴人识别并命名。其中，最具影响的传说是“巴蛇”。《山海经·海内南经》：“巴蛇食象，三岁而出其骨……其为蛇，青黄赤黑。一曰黑蛇，青首，在犀牛西。”《说文解字》小篆“巴”是个象形字，本义为蛇(虫)，或指传说中的“食象蛇”。大巴山以南的巴人，当缘于大蛇崇拜而视其为种族的“亲属”和“保护神”。先民们呼蛇为巴，然后过渡为族人之自称，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漫长岁月里，人们从事采集、渔猎生产，“宕渠居式”是他们原始生活的一种样貌。伴随土地的开发，农业生产逐步上升为主导产业，使氏族定居生活成为可能；同时，在与外界族群的交换和交流中，学习借鉴周边文化和生产技能，创造和发展了渠江流域的古典农耕文明，系统地构成一个独立的地域文化单元，即所谓宕渠文化。这是独具的一种文化样态，民族特征突出。其地域性与大巴山、渠江流域地缘关系紧密；其民族性与地理环境相对封闭，又处于连接中原文化与古蜀文化、古羌文化的通道和交流地带，因而宕渠文化又具备一定程度的开放性。“巴有将蜀有相”是两汉时期著名的人文景观，賈人“世挺名将”。

“清酒之甘醇，賈旅之劲勇，巴渝舞之雄浑，汉阙之神奇”是宕渠文化的精粹与缩写。

毫无疑问，“宕渠”二字承载了深刻的文化记忆。渠江流域的文化发展紧随中华文明前行的脚步，达到了同时代人发展的相应高度。物质文明成就卓越，具有特色；人文事略驰名海内外，辉煌史册，至今仍有其遗韵流淌。